

古代石刻叙录(四)

北京图书馆金石组

(六)李孟初神祠碑，全名“宛令益州刺史李孟初神祠碑”。隶书，文十三行，因下部残缺，每行字数大约二十八字左右，前二行首题“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阳李〔盛〕字孟初神祠之碑”。首行为十二字，二行七字。其字体比碑文约大四倍左右。碑有穿无额，很可能是以首题代额题之故，此为汉碑特有形式。建于东汉桓帝永兴二年（154）六月。原石早被淹没地里，宋代金石家尚无著录。至道光年间因白河涨水冲击出土，后又入土，后于道光、咸丰间又冲出，金梁于咸丰十年（1860）移南阳府署并在碑下空处刻跋，一九五三年又迁南阳市卧龙岗。

碑文以立祠为主，故不详叙李君事迹，仅提及曾举孝廉，任郎中等职，吏民追思德化为其立祠。有些官称如贼捕掾官等，史书尚无记载。碑文主要是立祠诸官姓名。碑文前八行，字大而疏，后五行渐小而密，永兴二年之“年”字垂笔拉的很长，约占两个字的位置，在墓碑中较罕见。《中州金石记》说：“书法疏秀似韩仁铭，为唐蔡有邻所本。”

北京图书馆有顾千里旧藏整幅拓本（长120，宽63厘米），末行“唐潭伯祖”四字未泐，为乾隆初拓，顾氏朱笔题名，穿中钤“顾广圻印”，它处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，“铁琴铜剑楼”等印。

(七)百石卒史碑，又名乙瑛碑、孔龢碑，全名为“鲁相乙瑛请置百石卒史孔龢碑”。唐杜佑《通典》，讹“石”为“户”，变“百石卒史”为“百户吏卒”碑，遂历代有沿误者。碑文十八

行，每行四十字，后汉桓帝永兴元年（153）六月建于山东曲阜，尾有二行正书题字，文为：“后汉钟太尉书，宋嘉祐七年张稚圭按图题记”。不知张稚圭所据何图，钟繇死于魏太和四年（230），距离永兴元年已有七十七年，钟仅三岁左右，非其书甚明。

碑载孔子十九世孙麟廉请求委派百石卒史一人掌管庙中的礼器，鲁相乙瑛代表孔麟廉书言于朝，司徒吴雄、司空赵戒又奏于皇上，诏鲁相选年四十以上精通经者为之，后相平又章奏其事。此官文书样皆具始末，称为“三式三公”。一是二人奏天子，二是朝廷下诏到郡国，三是郡国又章奏上朝廷。可见汉代奏牍之式。此碑是先叙以奏而附之赞，文章流畅，词汇文雅，气度高古，汉儒风采可见一斑。书势分纵横行，风神逸含，结构端谨严整，点画相宜，骨肉均匀。尤其落笔刚健，随势展开，既有丰韵，又有端劲秀丽之处，此为汉代名迹，极便于初学。

据《集古求真》所记：“此碑有宋拓本，而《校碑随笔》只云有明拓本。北京图书馆有顾千里旧藏整幅拓本，长172，宽85厘米，乃“壁”字稍剩之乾隆、嘉庆拓。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、“瞿氏鉴藏金石记”、“铁琴铜剑楼”等印。

（八）孔君墓碣，隶书，文八行，行十五字，额篆书题：“孔君之墓”四字，碑四周有几何花纹，后汉桓帝永寿元年（155）立，在山东曲阜孔庙。宋赵明诚《金石录》曾有记载，其后无著录。乾隆癸丑（1793），钱塘何梦华从孔氏墓林墙外移置庙内，碑下有阮元书题，以识其处。碑文多漫漶，然其世系、仕官职称略微可见，如：“孔子十九世孙”、“五官掾守长史兼行相事”等字尚可辨认。于此可知孔君乃为孔宙，孔彪兄弟之同辈。

北京图书馆有最初何梦华所得精拓卷轴长103，宽50厘米，无阮元刻跋，钤“何元锡印”、“小松所得金石”、“虚斋眼福”、“仲恂考藏”。此外，还有顾千里题名之旧藏本，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、“曾在伍诒堂”、“铁琴铜剑楼”等印。二者皆为乾隆拓。

（九）礼器碑，又名韩敕碑，全名为“韩勅造孔庙礼器碑”。

《集古录》为“鲁相修孔庙礼器碑”，《天下碑录》为“鲁相后颜氏鬃发碑”，《金石录》为“韩明府孔子庙碑”。碑文隶书，十六行，行三十六字，尾有韩勅等九人题名。碑阴三列，每列十七行，有六十二人题名；右侧四列，每列四行，有十七人题名；左侧三列，每列四行，有十五人题名。建于汉桓帝永寿二年（156）九月，立于山东曲阜孔庙。

内容系赞美韩勅修饰孔庙和精制礼器。其词以四言为句，铭文简质。首句五言，加“皇”字于上一格，高出碑文一字，碑版题名均列官吏爵里及纳钱之数，是汉碑特点之一。碑文有杂用之字，古奥尤多，称九月为霜月，五日为皇极日。讖纬之语不可尽通。字多假借，如“仰”作“印”等。

此碑文字结构严谨，工整中略带秀丽之意。四面环刻，其笔意各不相同。清代书法家对此碑推崇备至，王澐说：“隶法以汉为极，每碑各出一奇，莫有同者，而此碑尤为奇绝，瘦劲如铁，变化若龙，一字一奇不可端倪。”（见《虚舟题跋》卷二）历代受到重视，广泛流传。

最早拓本为明拓，但翻刻甚多，颇能乱真。“熹平三年左冯翊池阳项伯修来”十三字为隶书三行，清初精拓尚见，近拓已无影踪，而摹刻本却极为清晰。

北京图书馆有顾千里旧藏整幅拓本，长166，宽76厘米，侧长166，宽20厘米，是“圣人不世”不损之道光拓本，阴、侧皆全，钤“铁琴铜剑楼”等印。

（十）郑固碑，全称“郎中郑固碑”，隶书。文十五行，行二十九字。额为圭形，篆书两行，每行四字题：“汉故郎中郑君之碑”，额下有穿。汉桓帝延熹元年（158）四月二十四日立于山东济宁。此碑早已毁坏，所以欧阳修说：“文字磨灭，其官阙卒葬年月，皆莫可考。”其残石于雍正六年（1728）李鵠于泮池访得一块，即此碑右下角，得二十字又半字四，并刻有“郑固残碑残石”六字。此外，其碑文上段在乾隆以前每行仅十九字，计文二

百五十四字，又半字三；乾隆四十三年(1778)后，兰嘉瑄和李东琪掘土，使碑升高露出中段，使每行变为二十七字，得六十字，又半字五；现存石已有三百三十字，比乾隆前多七十六字。碑文为其弟所撰。所以文中“固辞”之“固”字写作“𠄎”，这是其弟为避兄之讳而作。为汉碑特例。碑字书风古劲拙雅，结体内敛中紧，横画左右开展，略与景君碑相似。翁方纲非常赞美此碑书法，认为“密理与纵横兼之，此古隶第一”。

北京图书馆有顾千里旧藏整幅拓本，长148，宽74厘米，额长43，宽22厘米，第七行“命”字末笔已连，系道光拓本，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及“铁琴铜剑楼”等印。

(十一) 苍颉庙碑，隶书，文二十四行，字存上半部，下半部皆泐，残字甚多，字数不可计。

碑为圭形，额有穿眼，穿眼左右皆有题字，右为汉熹平六年(177)五月二十八日衡升仲隶书题记，计五行，每行十字；左为宋嘉祐吕大忠题名，朱吉打题记，左行。正书，五行，每行字数四至七字不等。右侧上有“朔方临戎孙羨……永寿二年”，“朔方太守上郡仇君”等题记和题名，左侧有“议曹史莲勺，左乡有秩”等字样。宋欧阳修仅见此碑两侧，未见其它残石，故《集古录》误题“朔方太守碑阴跋及碑阴题名”。据《金石萃编》载，碑阴二列，每列二十四行，首行全缺，现仍为二列，上列为八行，下列为十四行；右侧四列，每列六行，末列首行全缺；左侧共三列，一列六行，二列五行，三列为四行，全碑字数约存二百三十余字。碑建于桓帝延熹五年(162)一月，为仇君子奉刘明府命所立，在陕西白水县史官村。碑石横卧土中，被王昶发现，后运存县学。

内容虽有追颂古圣贤之意，但主要是为追叙太守孙羨事迹。碑阴及两侧并记述孙全出仕始末及其掾属所出钱数。

此碑最早拓，据马子云先生考订应是六行“万嗣”之“嗣”字完好的明拓本，曾为端方旧藏，现存故宫博物院。北京图书馆有顾千里旧藏整幅拓本，碑阳长83，宽73厘米，额长66，宽17厘

米，右侧长86，宽17厘米，额侧长48，宽17厘米，阴长66，宽76厘米，是现存拓片中比较完整者之一。六行“万嗣”之“嗣”字，七行“六纪”之“纪”字，八行“非书不记”之“不记”等字尚可辨认。顾千里对此拓片十分重视，亲自用墨笔标明阴、阳、左、右顺序并于碑穿处钤“顾广圻印”，碑阴处钤“顾氏所收石墨”印，同时还加盖少用的“千里”印记四方，在右下方题“苍颉庙碑”，以示珍贵。

（执笔人张聪贵）

戴震之“志以考地理”

清乾、嘉时兴修方志之风最盛，有识之士终年笔于四方，有善于订定志例，有长于考证沿革，有工于撰述词章。后人称以戴震为首一派，为“考据派”，以章学诚为首一派，为“撰著派”，二派所纂成之志，至今犹称上品。

戴震修志以古今沿革为首要，说：“志以考地理，但悉心于地理沿革，则志事已竟。”

方志莫难于辨沿革，而戴震最精于考地理沿革；如震辨《元和郡县志》汾州一条中，纷然不治者六，详见震《与曹给事学闵书》。如此志震考子夏设教西河，在龙门，西河不在汾州，此正唐人之。误又从晁以道之说，以汾州之吕梁、狐岐，释《禹贡》治梁及岐辨旧说；以苏子瞻、曾彦和、阎百诗、胡臚明之穿凿，详晁以道之所不能详，斥蔡仲默引书耳食之病，使学者晓然。其考该之精详，以正历代诸家之说，非通儒大师则不能为此。然而当时的章学诚《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书》直斥震经术淹贯，而不解史学。考证古地理，而与治经、史何分，学诚“六经皆史”之说，岂自相矛盾。学诚对震之评价，不能使人认为是完全确当。

戴震所著考据地理之书，及所纂方志，于乾隆三十年成《水经注》一卷，于三十三年修《直隶河渠书》未竟稿，三十四年纂成《汾州府志》，三十五年龚导江修《寿阳县志》，聘震点窜，又为辨正，三十六年纂成《汾阳县志》，仅在六七年成水利书和方志五种，均为著名之书。

· 陈光贻 ·